

菲德尔·卡斯楚

在古巴统一革命组织
马坦萨斯省委会上的讲话



菲 德 尔 · 卡 斯 特 罗

在古巴統一革命組織

馬坦薩斯省委会上的講話

(1962年4月11日)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根据古巴《社会主义古巴》杂志
1962年第9期译出

菲德尔·卡斯特罗
在古巴統一革命組織
馬坦薩斯省委会上的講話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字数 21,000

1962年11月第1版
196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1·664 定价（四）0.15元

《社会主义古巴》杂志编辑部按：在馬坦薩斯省委会討論統一革命組織的狀況、宗派主义和工作方法的會議上，菲德爾·卡斯特羅同志作了總結發言，闡述了一系列基本思想，在某些方面成为对他3月26日的講話^①的補充和进一步說明。

下面是他作的總結發言的節錄：

同志們：

我們正在討論這個問題，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沉重的問題，如果某些事情在你們听來感到太突然，讓你們吃驚的話。你們應該記住，在一連几天分析所有這些問題時，我們好些天的心情是壓抑、痛苦和沉重的，是氣憤和痛心的。這些問題全是沉重的問題，同志之間感到痛心的問題，我們同志們不得不討論這些問題，并在同志們中間相互進行批評，在彼此之間有着摯情、彼此極其敬重的同志們中間進行了批評，但是我們不得不在同志們當中提出這些事情，討論所有這些問題，進行更深入的分析。

因為，很自然，為了得出結論，我們必須對所有這些問題作更深入的分析，我們也經受了這當中的全部痛苦；我們面臨一個痛苦的問題，必須在目前向如此熱情地接受了革命思想、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人民交待，必須讓人民第一次看到如此嚴重的錯誤。人民對

^① 指1962年3月26日所作的《古巴統一革命組織工作方法的某些問題》的電視講話。——譯者注

社会主义革命、对馬克思主义革命、馬克思列宁主义抱着美好的想像，抱着深深的信心，热情地接受这一切事物，然而突然之間却不得不面对着我们馬克思主义者身上的一个严重錯誤，革命的政治机构当中、統一革命組織当中的严重錯誤。

我們感到痛心的是不得不向人民提出这些問題。起初，我們甚至于考虑应如何进行討論，是否在各委员会中討論，是否让基层討論。但是，我們的結論是，不可能不向全体人民提出这个問題，尽管所有这些事情是沉重的。之所以沉重，是因为必須审查一位同志，是因为在这个領導机构的同志中間还有某些人情的因素需要考虑，像塞薩^① 这样一位同志固然是一位好同志，然而他对那位将受审查的同志却免不了会有兄弟的手足之情。

我們得出結論：最好还是向人民說明这一切，首先因为这是我們避免不了的必要，因为如果不向人民說明，他們将会听到无穷无尽的謠言，此外因为人民已受到这个問題的影响。你們对这个問題感到意外，在某种意义上說，我們自己也感到意外。

我們往往抱有一种乐观主义的傾向，把所有东西看成是玫瑰色的，因為我們有一种基本思想，认为我們的事业是正义的，认为我們的事业即使有种种錯誤，本身也是正确的；认为反对这个事业的人是可憎可恨的敌人，我們不容許我們維護的事业遭到攻击（这样做也是正确的）；因为尽管我們有各种錯誤，尽管我們会把事情做坏，但是归根到底有一条偉大的真理，这就是：我們在进行的事业，我們在維護的事业，是一件偉大的事业，是一件非常正义的事业，是我国人民的事业，是我們祖国的事业。此外我們还意識到，我們在对一个異常强大的敌人进行一場豪迈、壮丽的历史性搏斗。

① 指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的弟弟塞薩·埃斯卡兰特，他也是統一革命組織全國領導委员会委員。——譯者注

我們意識到我們的斗爭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它所包含的道义价值。我們的革命是的确无愧于我国人民的一桩偉业。

我們往往有一种有点唯心主义味道的想法，认为既然我們維護的事业是正义的，既然我們代表的事业是正义的，那么我們所做的一切就都是好的；我們所做的一切工作，不論我們怎么样做，也必然会向前发展，必然取得胜利。毫無疑問，这种想法有一定的道理，我們这种唯心主义的推理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只要稍微想想过去的事情和所犯的錯誤，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結論：由于我們的事业是正义和偉大的，尽管犯了各种錯誤，它仍然向前发展。

但是必須懂得，这有一个限度。我們犯了錯誤。确实我們不能說，所犯的这些錯誤是置革命于死地的錯誤。这些錯誤不是极端严重的，但是多少总算严重的，某些錯誤則是严重的。虽然錯誤不是极端严重的，但是非常多，这里可以运用辯证法的原理：量变可能引起质变，就是說，錯誤的数量上的增加可以对革命、对革命的力量、革命的命运和革命的前途引起质的变化。因此，現在我們必須拋棄这种傾向：即乐观地看待一切，而对次要的事情麻痹大意，或者把这些重要的事情看作次要的事情，而只关心我們自以为是主要的事情，只关心确实是主要的事情。这也正是我們会对这个问题感到意外的部分原因。

當我們决定开始對我們所做的工作进行一次批評，對我們的工作和革命的发展进行一次批評时，我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要这样做。但是当时我們还絲毫不了解这些事情积累了有多少。批評的必要比我們当时所想像的大得多。我們所犯的錯誤和所出的偏差要比我們在決定着手糾正时所設想的严重得多。我們多少感到意外，因為我們几乎是突然地了解到錯誤的严重性。显然，有一些因素起了作用。其中一个因素是：人民对革命領導人的信任在逐

步消失。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早先这里曾产生过一系列非常令人痛心的謠言，例如說卡米洛的失踪是由我們自己，由他本人的同志們一手造成的，这是革命的敌人散布的謠言，然而由于人民信任革命领导人，信任革命领导人的正直和品格，我們只不过反击一下，这些謠言馬上就烟消云散了。

可是，后来出現一种关于家长权利的謠言，这种謠言至少在哈瓦那流傳得很凶，有些人竟相信这种荒誕不經的話，竟认为剝夺家长的权利、把孩子集中起来、把他們送給俄国人管、把他們送进某个收容所这种无稽之談可能是真的……誰也无法合情合理地解釋能把这些孩子送到什么地方去；然而尽管这个謠言是那样荒謬透頂，却没有产生怀疑，因为这里牵涉到的不是一个理智問題，而是母亲的感情問題，因为已經形成了一种心理习惯，因为反革命往往事先就談論即将頒布的法律；然而頒布法律乃是理所当然的……他們說将要实行城市改革，将要頒布这样的法律，将要頒布那样的法律……后来果然如是，人們已經有点习惯于某种事物：只要有某种傳說，后来都果然会成为现实。

由于过去发生过突然換发鈔票这样一件不得不突然地进行的罕有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对于上述的心理习惯來說，又是十分意外的，同时也由于这不是一个大道理的問題，而是一个感情問題，于是一些人竟相信了关于剝夺家长权利的謠言，以至于我們认为有必要加以反击，于是我們反击了，謠言也就消灭了。我們只不过向人民讲了一下道理，只不过向他們說了一声这是謊話，也就够了。为什么呢？因为人民信任革命领导人；然而最近发生的謠言却是另一种性质的，已經影响人民对革命领导人的信任了；說什么菲德尔在某个大使館避难，又說什么菲德尔被囚禁了。尽管这种謠言

是那样荒謬透頂，居然有些人开始相信，我們当中的某些人确实在某个大使館避難。这一事实本身倒的确是对革命的危險，因为这就是在人們的腦子中塞进一些乱七八糟的不应有的想法；毫無疑問，從人們开始接受这类荒謬想法的一刻起，他們对革命領導人的信任就日漸消失。

这些問題促使人們有所警覺，促使我們更深入一些思考这些問題的原因，然而，在发生这些問題的同时发生了另一些問題，开始同阿尼瓦耳同志产生某些磨擦，同时在这些日子里，阿尼瓦耳已經无所顧忌地、几乎是一意孤行地追求个人目的。剛才在座的一位同志正确地指出，阿尼瓦耳所运用的方法、所造成的种种习惯，实际上为正在进行的反对革命領導人的整个宣傳运动提供了根据。不光是菲德尔同志，而且还有許多其他同志，他們在人民中的威信在逐漸下降。而事实上，这整个宣傳运动都是有事实背景为根据的，因为阿尼瓦耳組織了一个儼然类似政府的机构。阿尼瓦耳是形式上的权力，而不是真正的权力，因为他所搞的一切，都是多少靠了欺騙、奸詐和玩弄手段搞成的。很明显，他所苦心經營的一切不过是一座紙牌砌成的堡垒，然而事实上，阿尼瓦耳以自己个人代替了統一革命組織全国領導委员会；他就是統一革命組織，他一个人代替了領導委员会的所有其他同志，代替了書記处，代替了領導委员会的所有其他同志。甚至代替了政府和各部长。

这是怎么搞的呢？难道阿尼瓦耳是个得天独厚的人，是个天份非凡的領袖，以致人人都来向他討教嗎？不是的。固然阿尼瓦耳是苦干的狂热的工作人員的典型，他的狂热却是野心家的狂热，因为到了阿尼瓦耳那样的年紀，还像他那样进行这样異常广泛的活动，那么不是出于公尔忘私的偉大热情就是出于狂妄无度的野心，二者必居其一。他之所以抱着个人目的而能得意一时，是因为在

某些根本問題上產生的普遍混亂，向他提供了有利的條件，然而最主要的，是因為他利用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威信。

馬克思主義思想已經被全國人民衷心而熱情地接受。只要回憶一下第二次全國人民大會的情況，誰都記得人民是如何善于明辨是非，人民對於提交這一在全世界都算盛況空前的巨大集會考慮的宣言的每一字每一句和其中包含的思想，是如何善于思考其價值，誰都會看到人民在政治上是多么敏銳，都會認識到我國人民有了多大的進步。我國人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思想、馬克思主義原則，也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黨的領導作用的原則。黨實行領導，實際上人民也同意必需有一個強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由這個黨來實行領導。所有人、全體人民都的確認為統一革命組織起黨的領導作用。此外還相信我們是有集體領導的。阿尼瓦耳手段高明之處在於，他設立了一個辦事處，叫人們以為這就是傳達全國領導委員會的意見、下達黨的方針的地方。而實際上本來是應當同統一革命組織商量討論的。

他鼓吹這種想法（我下面還要談到他是怎樣在黨內鼓吹這種想法的），由於人民普遍尊重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尊重黨作為領導機構的作用，他易如反掌地使得人人都相信，同統一革命組織商量、從統一革命組織取得指示是理所當然的事，是一種責任。既然人們已習慣於到這所樓房來听取指示，到這裡來又是只到他的幾個辦公室去，到他的辦公室又是只找到他一個人，於是，埃斯卡蘭特搜羅到一批同他一起工作的下屬的同志。如果有誰沒像大伙一樣養成這種習慣，他會設法非常巧妙地提醒人家注意這一點，同時不致令這位同志起疑。他問道：你怎麼沒有同統一革命組織討論就做了這件事呢？統一革命組織就是他。他說：“你不能擅自做這件事，不能擅自做那件事”，那位同志就誠誠懇懇地接受了意見。

沒有問題，他是在執行一種壟斷和控制一切活動的政策，一種壟斷和控制黨的機構的政策。阿尼瓦耳同志在致力實現的是一種類似的政權；然而對此人們會問，這會有一天成為真正的政權嗎？回答是否定的。這有許多原因；首先是因為，不能想像，能把這樣的政策強加於我國這樣的人民，強加於我們大家這樣的革命者的隊伍，而不在一定的時刻產生危機；其次是因為，這條道路不會使阿尼瓦耳取得權力，也不會使任何人取得權力，而只會導致革命政權的毀滅。再者，這種類似的政權之所以永遠不能變為現實，是由於下面兩個原因：因為它早晚会發生危機，早晚会原形畢露；其次，因為即使不發生危機來收拾這種局面，也不會促使阿尼瓦耳取得政權，而是使反革命分子取得政權，造成像巴黎公社那樣的失敗，反革命取得勝利，而革命者則紛紛人頭落地。

自然，他是認真追求權力的。他建立了一個類似政府的機構，然而他心目中不以為他是製造一個類似的東西，而是實行一個對他關係重大的計劃。正是由於他當時在實行的這個計劃，由於他的野心所產生的政策，他從他所佔據的關鍵地位推行了在整個統一過程中所運用的方法。我們不打算說，全部錯誤都絕對應由埃斯卡蘭特一個人負責。應該善於把阿尼瓦耳的責任同我們全體的責任以及這裡逍遙自在的無數阿尼瓦耳的責任區別開來。

然而，毫無疑問，他的活動，就我們所知，起了很大的影響，這表現為一系列真正惡劣的方法，一種確實對革命惡劣和有害的政策，因為他把這些方法和這種精神散布到我們正在建立的整個組織中，由於他散布這種風氣，起義青年組織竟也鬧到同統一革命組織中的情況一式一樣。在起義青年組織中是一切依樣畫葫蘆。在組織書記處中高踞着一位同志，他就是個雙料的阿尼瓦耳，唯一不同之點是：這個年青人身上沒有野心問題。他們看到阿尼瓦耳怎

样做，他們也就怎样做，起义青年联盟的組織書記处解决一切問題，絕對全部問題。

他还尽一切可能向其他群众团体散播这一政策和这种方法，給革命造成了实际的損害，因为这甚至对生产发生了不良影响，同志們。我們在生产上有問題，虽然并不是所有生产方面的問題都是由于类此的原因，但这个問題甚至也影响到我們目前的供应困难。

阿尼瓦耳从一开始就貫徹到整个統一工作中的政策和精神，遇到了有利的条件。誰給了阿尼瓦耳这个职务？可以說，阿尼瓦耳是自己任命自己担任这一职务的，或者說他是自己伸手去抓的，抓来的，确实是自封的，他要求一件工作，把这个职务抓到手，就千方百計把这个职务变为全部問題的中心。我們后来知道，这位同志过去有一系列的表现。我們痛心地发现，在他担任老党即社会党領導机构成員的整个时期，他有过許許多多专橫粗暴的行为。

阿尼瓦耳的这种品质在种种不同的条件下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在3月10日政变以前的一个阶段，問題不过是个人的修养差些，有时显得粗暴，某些方式方法过于生硬，对同志不够体贴。在政变以后的一段时期，他利用了政变带来的条件，即进行地下斗争、党处于非法地位、处于地下状态、集会困难、布拉斯同志又病倒了这样一些条件，这些条件使他可以任所欲为，靠阴谋詭計、欺騙、謊言以及一整套手段，实际上控制了正在进行的工作，已經甚至发现，他当时作了安排，使得某些同志如拉薩罗·培尼亚和奥尔多基不在国内，他实际上使拉薩罗·培尼亚在整个地下斗争的时期都远离古巴。現在，已經清楚，让这些同志远离国内，是沒有任何道理的。

現在，这一切是真相大白了：这样做是对他个人有利的，这样

做就造成一种条件，使他得以一手把握大权领导这个党的工作。然而，阿尼瓦耳的老同志们只是直到最近才开始感觉到，阿尼瓦耳的待人接物，并不单纯是一个脾气和性格的问题，也就是说不是方式方法问题；如果说在过去一个时期一切似乎都表明，这不过是方式方法上过于生硬、严厉、粗暴、不体贴，但用心还是好的，那么现在他们开始明白，阿尼瓦耳的处事和待人并不仅是存在着方式方法的问题，而是居心不良的问题。

某些同志问道，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怎么早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呢？首先必须考虑到一个组织在地下活动所处的条件，革命胜利所引起的条件的变化以及新的条件的出现，还应考虑到，他的态度也确实迷惑了人，人们长期以来都以为这只是方式方法和性格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野心的问题。

我们这些实心实意的人、我们这些真正忠厚老实的人感到意外，那是并不奇怪的。如果我们假定一个同志只有崇高的革命的理想，而毫无其他念头，那么自然很容易感到意外。连我们自己过去也绝对没有想到过，这一切外表现象下竟包藏着野心！这里应该说，他所干的事，不仅是犯罪，而且是愚蠢的行为。我们怎么会想到，居然有人会这样愚蠢，居然有人会这样糊涂，竟至于在我们目前这样伟大的事业当中，在我们的革命这样包罗万象的巨大任务当中，一心一意为自己建立一个宝座，形成个人权力，满足个人的权力欲望？谁会想到这一点呢？谁能设想，在这次集会上，在座诸君之中有人会拔出左轮手枪对我们射击呢？在我们看来这是荒谬绝伦的，绝对不会有人生出这样的念头。这一切正如同拔出手枪对准革命的心脏射击一样荒谬，没有人会这样预料的。

一切诚心诚意的人都不会想到这上头来，尤其是当人人都忙于对敌斗争，当我们人人都忙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付入侵的

威胁、致力解决我們这一年所面临的种种問題的时候。因此，我們实际上几乎是把处理合并問題这样的重大任务委托給一个同志，信任他，信任他的才干，信任他的忠心，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那样的政策，而我們对这种政策却像是如梦初醒。我們在全国领导委员会中举行了多次會議，討論了錯誤，討論了一些同志在这个問題上所应負的責任。由于缺乏远見，沒有及时采取决定，或者不如說是由于粗心大意，由于有点疏忽，有点疑慮，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犹豫不决，这个問題沒有能及时提出来，沒有能更早提出来。誰也不能猜测这个問題應該早一些还是晚一些发现，因为这甚至在問題已經到了暴露的地步之时还是很难办到的。資本主义的罪恶，也是在資本主义已經发展起来时才暴露出来的。許多疾病的发现，是在病情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时候。因此，这一弊病沒有能及早加以反掉，沒有能在我們发现这一弊病以前加以反掉，乃是完全可能的事。

只有少数人能看到問題往往是不够的，实际上不是往往不够，而是在任何問題上只有少数人看到問題都是不够的。有些人看得比較远，比較深。但是，为了克服一种弊病，必須許多人都意識到这种弊病的为害。实际上，已有許多人意識到这种弊病的为害。你們已經意識到这种弊病的为害。表現在哪里呢？表現就是：你們不同意所发生的一系列办糟了的事情，虽然沒有人能清楚地說明这些办糟了的事情的根源何在。唯有当各省都发生許多事情，让同志們可以举出一連串事实，并表明已經有了充分的判断的根据使得有可能开始克服一种政策引起的弊病的时候，才能反掉这种弊病。

而且，这些弊病也不可能在別的时候克服，只有在今天，当革命已經有了明确的道路，有了絕對明确地規定在馬克思主义营垒

內的意識形態，這些弊病才有可能被消除。正是靠了所有的馬克思主義原則，靠了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我們才能够着手克服在我們的馬克思主義中產生的缺點，因為當不存在這種條件時，當鬥爭是在思想領域內進行時，當對保守或反動流派進行鬥爭的時候，當整個鬥爭的鋒芒必須針對帝國主義思想時，的確很難開始考慮並解決這樣一個問題，而且不到實際上問題本身已發展到有目共睹的時候，也是不可能着手考慮並加以解決的。

確實，人民看出這些問題比組織本身還要早，群眾的嗅覺比革命黨員還要靈，早在一些時候以前，我們的人民群眾就開始看出一系列的不正常現象、不正規狀態和不正確的事情，而我們革命黨員自己對此還沒有看出來，這就再一次說明了，我們是生活在象牙之塔之中，實際上同群眾失去了接觸。

這個問題被稱為宗派主義問題，然而宗派主義一詞還不夠廣泛，還不足以概括我們正在糾正的所有問題的性質，因為可以有一種狂熱的宗派主義，一種誠實的宗派主義，這種宗派主義是從好心出發，堅決而執拗地認為，凡是思想和自己不同的人，凡是不參加某一個集團的人都不是好人。這種宗派主義是不好的，它本身就造成損害，然而現在不僅止是一個宗派主義的問題。

宗派主義成了一種工具，一種政策的工具；一整套政策的工具；然而這種政策的內容並不止於宗派主義。宗派主義不過是一種工具，實際上這是一個脫離馬克思主義原則的問題，是一個特權的問題，是一方面偏激另一方面放任的問題，是等級觀念，甚至於出現腐化墮落、講親戚關係、朋友情面、徇私苟且、機會主義的萌芽的問題，是形成這整個情況的一系列事情，是正在發展的一整套政策的問題。

宗派主義不過是一個工具。宗派主義沒有遭到打擊，本來是

应当对它进行斗争的。一种健康的政策原应是从一开始就对宗派主义进行斗争，正如同过去对其他宗派主义分子进行了斗争一样，因为宗派主义本身，姑勿论构成这个问题的其他因素，就已经糟糕了。然而，光是宗派主义当然还不算那么糟糕。宗派主义成为一种政策的工具，那才不止是糟糕，而是严重，十分严重。宗派主义甚至不是一种激烈思想。有一种大错特错的想法，以为宗派主义是一种什么激烈的东西。宗派主义甚至于可能是一种反动的宗派主义，它的作用更多的是妨碍革命思想，使革命发展开倒车。宗派主义虽然在革命的环境中有其产生的原因，但并不意味着人们的一种激烈情绪，革命情绪，甚至不能说它总是一种过激的立场。宗派主义的产物是严重脱离群众，使革命的政治机构遭到削弱，使革命遭到削弱，使革命患了贫血症，丧失朝气，失去力量。

为什么呢？因为宗派主义使任何革命政党脱离群众，而对任何革命先锋部队来说，抚育它的是群众，扶养它的是群众，对任何革命组织来说，给它输送血液、赋予它力量的是群众，脱离群众、与群众失去联系，就等于割断了革命组织和群众之间的脐带，割断了革命组织吸取养料、吸取血液、朝气、力量，取得干部的途径，因为力量和朝气全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因为一个革命机构的存在，不是为了革命机构本身；一个革命机构的存在是为了革命的群众。这就是它存在的理由。革命是由群众来进行并且为了群众而进行的，进行革命要有一个为群众着想的群众的党。这是一个党存在的理由，它的全部声望和权威决定于它同群众的实际联系。这个党并不因它是一个党就在群众中有权威，而是因为它在群众中有权威和声望，才成其为一个党。假如它同群众没有联系，在群众中没有声望、没有权威，它就不算一个党；它就变成了一个患了残疾的可怜的组织，越来越不成其为政党了，因为它的生存的依据就在

于它同群众的联系。

宗派主义势必产生特权，一方面是纵容，另一方面是不信任。产生了普遍的不信任，凡是沒有一定的条件、沒有一定的經歷的人，具体地說，沒有老黨員的資历的人，都是不可靠的，都被认为未經受过考驗的人。但是，如果在地下活动时期和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宗派主义是不好的話（之所以不好是因为如果一个革命組織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同群众沒有联系，就决不能取得政权），如果在处于反对派地位时宗派主义是不好的話，那么在执政时就更不好，更有害，更荒謬，更不可想像；尤其不可想像的是，这发生在几百万男女采取了一种革命的立場，一种革命的态度并且接受了馬克思主义的时候，而他們的接受馬克思主义并不是因为受到他人的灌輸，而是因為他們在自己革命斗争的实际生活中，在天天不断地同反动派、同帝国主义、同敌人斗争当中，在三年中所学到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說，是平时三四十年也学不到的。

革命的一年，列宁不是說一年，列宁說六个月，从1917年的資產階級革命到无产階級革命的六个月，在这六个月中，俄国的群众所学到的东西超过以前三十年中所学到的东西，而我国的群众則是面对帝国主义，随着斗争的鍛炼，随着广大劳动群众的階級意識的觉醒，学到了許多东西，发展壮大，热心地、真誠地皈依了馬克思主义思想，这是无需证明的。

在这种情况下，抱有宗派主义更是加倍荒謬无理。本来應該同宗派主义进行斗争，但沒有进行斗争；过去曾同别的宗派主义进行了斗争，这种斗争取得了輝煌的成果。試想，一个五十万居民的省份，却只有二百七十七名黨員，你們自己也能明白抱有宗派主义是多么严重了。你們以为支持革命的人，我是指农民、工人和劳动者阶层，就只是二百七十七人了吗？宗派主义把一省的全部工作全依

靠这二百十七人，它引导到多么荒謬的道路上去啊！

这里說二百十七人，但是我肯定，在这二百十七人中，至少有一百人被从这个省調往别的省去了，去担任别的工作了，去做别的事情了，在这个省中大概只留下八、九十人了。制造这种虛荣心，制造这种等級風气，制造这种“我是多少年多少年的党员”的問題，制造这种虛荣的事情是令人气愤的。因为这种人的数目越小，他們就越是使得数以万計乃至数十万計的不像他們的人处于不利的情況，光是宣揚这些已在群众中产生激怒和气愤，何况在此同时还有在各战綫上执行一种宗派主义政策的现实情况，这种政策使人人沒了指望，如果他不屬於那些能說“我們是多少年多少年党员”的人的集团，他就不能当行政领导人，不能当工会领导人，不能担任一个重要的职务，不能担任一个报酬很高的工作，不能取得一个榮譽的地位，不能得到助学金，不能出去旅行等等；何况实际上这已不是一种說法，一种宣揚，而是同发生的事实有联系了，其結果是由于不断抽掉所有老的革命人員而削弱了工作单位，例如公共汽車公司的情况就是如此，单单在一天內，从这个单位抽掉了四百名老党员，使这样一个重要的单位实际上一个老党员也沒有了；另外，在隨便哪一家工厂中，人們可以看到，人民和群众可以看到，假如那里有十二名老党员，那么就有六人被調走，一人去G 2工作，一人去做外交信使工作，一人去做外事工作，一人去管理一件事情，一人出国訪問，还留下六人，在留下的六人中，他們派一人当行政领导人，一人当人事处长，一人当車間主任，一人当其他工作的負責人，于是一个也不剩了。

当后来要成立革命支部时，又采用了宗派主义的方法，行政领导人、人事处长、車間主任、这些同志們各自的女秘书和一些亲密朋友都当了支部成員。群众通通免进！我們了解到，我們采用的

一些方法如何使我們在任何一個四百五十人的單位中脫離群眾，完全脫離其他四百三十八人，按照所遵循的準則，這四百三十八人毫無希望被提拔擔任任何職務，得到任何榮譽，擔任任何工會領導，做任何工作、任何事情。他們是缺乏經歷、沒有歷史、沒有經歷，因此沒有希望的群眾。這是脫離群眾。

當然，這裡存在一系列問題，一系列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問題，這些原則遭到破壞。首先：應當從群眾中選拔幹部，假如按上面的辦法組成革命支部而所有榮譽、所有職務、所有代表都來自支部，假如支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支部自己，那麼這個支部就不是成為革命的支部，而是成為一個享有特權的支部。事實上，支部的使命正是為了群眾，為群眾著想。支部的使命是為群眾犧牲，教育群眾，提高群眾的革命覺悟，從群眾中選拔幹部，當有人要求支部的人擔任一個職務時，應該說，“不，這裡有一位工人同志，他懂得許多，他的條件比我好，因為他更有耐心，因為他有這優點。我們要提拔這位同志，這位工人”。於是，這個支部由於它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群眾，因而將得到群眾的熱愛、同情、欽佩和尊敬。支部中的人是最有自我犧牲精神的，他為群眾，為工人群眾獻出一切。參加組織是每個工人的最高榮譽，同時群眾中的每個人都能被提升為人事處長，每個人能被提升為行政領導人，擔任任何工作，最後能被吸收為支部成員；作一個支部成員是最高、最卓越的榮譽。

當工會領導人，當一個好工人，當一個好領導，在生產中有特出的成績，應該是加入支部的途徑，支部不是擔任行政領導人、人事處長、工會領導人、這個職務或那個職務的途徑。工作、責任應該是加入支部的途徑，而支部不是途徑，因為否則的話，人們就以為發現參加支部是取得榮譽、取得報酬優厚的職位和取得種種利益的門路，人人都要去敲支部的門了。支部不是途徑，而是目標；

如果支部是宝座，要通过牺牲和工作的道路才达到这个宝座，那么机会主义者就不会去敲支部的门，他们必须先敲功迹的门、牺牲的门，才能够有一天得以加入支部。没有问题，至少人们对一个工人阶级的先锋政党、一个同群众有联系的政党、一个对群众有威信的政治党的看法，就是我们对革命的支部所抱有的看法。同志们，以前在这里要当教导员，要进一所军事教导员学校，要担任军事指挥员等等，必须先上一个支部的名单，而名单上的人都调光了。哈瓦那的各支部有三百五十名党员，现在减到了七、八十人，其他人都调走了，把他们分散到各地，担任各种职务，甚至于使原有的组织瘫痪，患了贫血症，最初调走优秀的干部，然后调走那些不是优秀的干部，中等的干部，然后调走不好的干部，然后起用那些开小差的人，那些曾经不忠诚的人，然后招揽堂兄弟，表兄弟，亲兄弟，叔伯，亲戚，不是造成一种阶级观念，而造成一种种姓观念。

在这里曾经选人当教导员，在沒有老党员时，就选老共产党员的儿子，选老共产党员的堂兄弟、表兄弟，好像我们生活在中世纪，生活在伯爵侯爵的时代，而不是生活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一些支部已经调光了，因为已经养成向阿尼瓦耳要干部的习惯，而阿尼瓦耳把名册上的人员都调空了，但是事先他使每一个被任命的人都经过他的手，他使每一个被任命的人知道，他的意志是多么的了不起，他非常巧妙地多方设计，总让人感觉到他如何办事特别认真，其实这种认真只不过是根据支部的名单要人罢了。

党的老人员都调光了，老组织抽空了，最优秀的干部都调走了，很自然后来留下的人就升上去，但是总是根据同样的方针，同样的原则。根据他所遵循的政策，树立的就不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先锋政党的原则，而是一个享有特权的小集团的原则，不是树立牺牲思想，而是树立特权思想，不是树立党的思想，而是树立小集团

的思想，高高在上的思想，发号施令的思想，自以为身在支部就有权发号施令的思想，以为党的作用是在各级发号施令和在各级进行统治的思想。

党进行统治，但是是通过它的一定途径进行统治，通过国家、通过领导党、领导政府和领导群众组织的全国领导委员会进行统治；党通过它的一定途径实行领导和指导。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而是造成和企图造成纵容的风气，“你是属于支部的吗？你是动不得的，你可以犯一千个错误，一万个粗暴行为……必须保护干部，干部是动不得的，他是一个干部，他是一个好干部。”当“干部”就可以完全不受法纪制裁，其实一个干部应该更加守法，一个干部的特权应该更少，权利应该更少。对一个干部的要求应该比对任何人都更不能宽容。但是，当时却恰恰相反，执行的是一种造成高高在上与发号施令的作风的政策。

这种干预在各级都有。发生了什么呢？各支部的普遍的倾向是指挥和干预行政。对整个国家行政机构，对所有各级，都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干预。行政领导人有权无权，部长们有权无权。发生了真正的混乱、真正的无政府状态。

要是任命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担任行政领导人却不让他有可能行使职权，那么任命他又有什么用呢？那些负有行政职责的优秀共产党员、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们知道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他们对这种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因为他们实际上受到束缚，无法有所作为，因为他们人人都有过卡洛斯·拉斐尔^①那样的遭遇。卡洛斯·拉斐尔曾经想把一个靠了宗派主义而安插上、靠了宗派主义而一直没有被撤销职位的完全无能的同志免职，然

^① 指统一革命组织全国领导委员会委员、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Carlos Rafael Rodriguez)。——译者注

而当他下令把这个人免职时，人們却对他說，这件事得由支部討論。对一个統一革命組織全国領導人、老黨員、一个国家机构的主任尚且如此！如果部長們已經无权撤換一个企业的領導人，那么怎能要求任何部長負責呢？进行討論是正确的，應該同所有人討論，要討論多少次就討論多少次，但是決定权應該屬於行政領導人，因為人們追究責任时，不能去追究三百个人，而只能追究一个人。

有一种不信任人、对人人都提防的政策。有人命令一个保卫委员会、一个支部去調查常备師的首长这样一些老革命同志、这样一些受到所有相識的人完全信任的同志，而命令人們去調查他們，就像俄国革命时对付一个沙皇將軍一样。可能爱好类似方法的人曾經在书本上讀过苏联党是如何調查沙皇旧將軍的，但是他們却没有看到沙皇將軍同一个起义軍指揮官有极大的区别，因为每一个起义軍軍官都曾經经历尽患难，在这期間会开小差的都开小差跑了，而他仍然无限地忠誠于革命。我們竟采取了这样一种政策：对一切有保留，喜欢广泛审查，政治委員想发号施令，師的革命教導員想取代师长，选拔軍事人員时根本不考虑本人的素质，不考虑他是否忠誠，不考虑他的身体条件是否适合担任軍事工作。

这些就是产生这种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的根源。你們，作为有觉悟的人，作为革命者，知道这些东西是削弱革命的消极現象，当你們在这儿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自問，一个老共產黨員对无产階級政权，对无产階級国家的看法难道可能是这样的嗎？当老黨員、老共產黨人过去渴望政权，渴望革命政府时，难道他們以为革命政权、革命政府就意味着这一連串錯誤、胡作非为、橫行霸道、虐待、专制嗎？你們在渴望无产階級政权、向往无产階級政权时，有誰会以为无产階級政权是集各种各样的錯誤、妄为和殘暴的大成？

任何一个老党员，老革命者，絕不能設想这些东西竟会在无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国家内部发生。

同志们，这些却都不是小资产阶级干的事情，不幸的是，它们常常是由无产者、老无产阶级战士干的。为什么呢？因为方法的緣故，因为拋棄了正确的方法，因为拋棄了原則的政策。

正是由于这样，出現使人感到羞愧和使我們感到难为情的事情。这些事情甚至发生在你們的省里。我知道这里担任总书记的同志不是一个宗派主义的同志，我了解他，我曾經有几次与这位总书记同志談过話，了解到他是一个心胸开闊、有毅力、希望把事情办好和解决問題的人，他本人也不得不对这些風气叫苦連天，因为这些風气已經波及全国，从迈西角到圣安东尼奥角的全国各地，而且超越領導人和書記之上。我之所以有这种印象是因为这位本省的最高領導人并不是一个宗派主义的同志。

然而，我們从“老爷爷”^①听到的情况，令我們感到痛心。他在这里訴說的种种情况引起了人們真正的憤慨。使人打心里感到真正憤慨的是，对这位同志如此不体貼，对这位同志如此殘忍。你們可以确信，任何一个正直的領導人絕不会使一个同志这样地工作，絕不会使这个同志受这种磨难，絕不会使这样一个身体衰弱、病魔纏繞的同志来領導一个恰恰工作最重的省份。

这里面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打算呢？难道不正是要叫这位同志把事情办坏，让他丢臉嗎？难道不也許是利用他是布拉斯·罗加同志的兄弟这一事实，好借題發揮，来反对布拉斯·罗加同志本人嗎？这是为了什么？这怎能說得过去呢？我們会指派一个这样的同志去打仗，去担負任何工作嗎？我們会派他嗎？不。这里却任

^① 指馬坦薩斯省委总书记。——譯者注

命了一个同志担任他的身体条件所不能胜任的工作。这是什么呢,同志們,不是沒有人性又是什么呢?

有誰說过馬克思主义就是拋棄人类感情、拋棄同志感情、同志爱、拋棄对同志的尊重和体贴呢?有誰說过馬克思主义就是沒有灵魂、沒有感情呢?正是对人的爱产生了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卡尔·馬克思爱人們,爱人类,渴望消除无产阶级的不幸,渴望消除无产阶级所遭受的贫穷、不平、痛苦和一切剝削,才在产生馬克思主义的条件已經成熟的时候,在馬克思所代表的社会革命有了实际的可能,不仅是实际的可能,而且还有历史的必然性的时候,才从他的头脑中产生了馬克思主义。如果不是因为像他、像恩格斯、像列宁那样的人具有充沛的人类感情,他又怎会成为这种历史必然性的闡述者呢?

誰要想叫人相信,当一个共产党员就要沒有灵魂,那末他对共产党员的看法就是同帝国主义者、誹謗者、誣蔑者的看法一样的,因为一个共产党员必然首先是一个有人性的人,一个善于尊重他人、善于尊重他人的感情、善于尊重他人的尊严的人。这是首要的一点。

我們現在所反对的这些現象不是共产党员所应有的,不是革命者所应有的。这种政策能对革命有什么好处呢?这种政策只能对帝国主义有好处。帝国主义正在等待着革命到了一定时候就像一个烂果子一样自己掉下来。这就是帝国主义者最好的希望,就是他們最大的希望。我們知道,帝国主义者死不甘心地希望革命垮台。帝国主义者虎視眈眈,密切注意动静,如果說我們閉起了眼睛,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懵然不觉的話,那么敌人並沒有打瞌睡。敌人睜着眼睛,注視着眼前的动静,注意寻找并利用我們的弱点。沒有疑問,我們是有很大的弱点的,因为在古巴革命的条件下,一个

工人、一个合作社社員、一个农民竟会有不滿，这是完全說不过去，的确完全說不过去的。

从我們手中分到土地、靠了我們才解除了向地主付地租的負担、从我們手中得到貸款的农民，靠了我們才免除了淡季失业的痛苦、靠了我們得到学校并正在获得住宅的工人，竟会不滿，这怎么可能呢？这些从革命得益最多的阶级竟会发生不滿，原因何在呢？如果不是因为我們自己的錯誤，我們的失着，我們对人民的刻薄、对人民的輕視、我們对人民的傲慢态度，那么又会有什么原因能引起最微末的不滿呢？因为只有对人民傲慢的人，才会随便在一个村子停下来，开口就說，人人都是反革命，給我弄一个絞架来。这是什么表現呢？难道不正是小资产阶级精神的表現嗎？这正是不折不扣的小资产阶级精神，因为小资产阶级在他們的錯誤引起人民的不滿的时候，从来不勇于承认錯誤，而是把錯誤推給人民，认为自己是唯一的革命者，而人民都是反革命。

在广场上停下来說这种話的同志，表明了他具有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的精神和反应，他自己犯了錯誤，却把过失推到群众头上，当群众并非反对革命、只不过反对他的专横时，他却指責群众为反革命。

最不能容忍的是，我們最后对群众絕望了，指責群众是反革命了，而如果群众是反革命，那我們該是一群十足的蠢材，我們当初就是在沒有革命条件的地方胡搞革命。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在任何現代革命中，群众对革命的支持、对革命的热情，从来没有古巴群众对我們的革命表現得那样强烈。那么，我們現在怎能得出結論說，人民的不滿并不是由于我們种种昏庸愚蠢的表現，反而說我們是十分革命的，而群众是十分反革命的呢？

显然，假如革命为这些阶级解除了剝削而这些阶级还不是百

分之百的拥护革命，那么責任应在我們身上，弱点是在我們身上而不是在群众身上，弱点是在我們的群众工作上，弱点在于我們的无政府状态，在于我們摆权威架子和专橫独断的傾向，在于政治上麻痹，在于我們的粗暴无礼，这样我們虽然希望壮大革命的力量，爭取人民拥护革命，但却是一天到晚以我們的所作所为使革命的威望遭到損失，用拳头脚尖对待人們，为自己树立成千上万的敌人。

弱点是在我們身上，我們应当首先認識这一点，認識到我們作为政治家是很差的，我們在革命工作中是很差的，我們必須在一切战綫上、在一切方面提高革命工作质量。这是我們必須得出的結論。

把賬都算到敌人头上，成不成呢？敌人利用我們的弱点，然而敌人的广播、敌人的宣傳要是沒有可以滋生的土壤，要是沒有許多人感到受損害，感到不滿，感到憤懣——說的是他們看到別人遭到不平，因而以为明天他們可能会有同样的遭遇，至于他們亲身遭遇过的不平，就更不必說了——那是无论如何也鬧騰不起来的。

在馬坦薩斯省誰也不应当擅自随便地、不根据法律、不等候指示和領導而进行土地改革，因为这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特殊問題。誰不知道，革命需要处理这些問題呢？誰不知道，在农业中，革命所要解决的許多問題比消灭大庄园主的許多問題要严重得多呢？誰不知道，在土地革命方面，我們今后要实现許多阶段，要是我們乱搞一气，我們又怎能实现我們的計劃，我們又怎能前进呢？农民問題是一个十分微妙的問題，是社会主义革命所有問題中最困难的問題。把工厂收归公有，在工业中展开一个社会主义計劃，那是容易办的。工人基本上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他从来沒有想成为一顆螺絲釘、一个輪子、一所工厂的主人。困难的是，在农业中

进行革命，而又不影响生产，不影响工农联盟。假如有必要把不当地被沒收的农庄发还原主，我們將把它們发还。

我們不要害怕，以为这似乎是倒退了一步，相反的，假如发还被沒有道理地沒收的农庄能使成千成万应当同革命一起前进的人們安下心来，那么最好还是把它們发还，因为这将使我們能更有力量、更有把握地前进。我們必須对残余的私人利益采取一种不同于对大庄园主的政策，因为大庄园主只是无足輕重的少数，而中等有产者則是成千累万；庄园主是脱离土地的寄生虫，而中等有产者一般都是同土地有联系的，他們耕种、照料、侍弄自己的土地。

我們要怎么办呢？我們要讓他們流落街头，讓他們和他們的子女一起挨餓嗎？我們要接管一个經營得法的七卡瓦耶里亚的农庄，让它在三个月之內就垮掉，让所有的人都看着它垮掉，让工人自己看着它垮掉嗎？这样做受損失的是誰呢？受損失的是革命的威信，在工人中喪失威信，在人民中喪失威信，因為他們亲眼看到一个家庭被弄到挨餓；先生們，受損失的是革命，因为这七卡瓦耶里亚土地本来能生产食物，却什么都沒有生产，革命也就吃了亏。这种愚蠢的偏激情緒對我們有什么好处呢？

这不是富有革命性，这是阻碍革命，这是給革命的进展制造障碍，这是阻碍革命的发展。这样，革命是不能前进的。这些人根据什么說这是富有革命性，是革命性更强呢？正相反，这甚至是反革命，因为这造成前进的困难，造成供应的困难，因为这使革命的威信扫地。今天只要播种馬兰加芋就是支持革命，因为今天革命不得不忍受必須配給馬兰加芋的耻辱，帝国主义者正是对拉丁美洲人民这样說的：飢餓、貧困、配給制，这就是社会主义。我們不得不配給馬兰加芋，为什么？如果孩子們需要馬兰加芋却又得不到，那是为什么？这对我們有什么好处？这个政策的革命气息何在？这

对革命來說算是什么进展？这是什么威信，什么道义，什么权威？难道干革命是乱搞一气？干革命是无紀律地行动，想怎样就怎样？干革命是制造混乱？

正是这种思想方法在我們古巴人中間造成了极度无政府状态的萌芽。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我們在很多地方見到的是无政府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如果一个工人对此表示不滿，那他的不滿是对的。因为他不同意这种胡鬧，而胡鬧并不是社会主义。他不同意专橫霸道，而专橫霸道并不是社会主义。他不同意无秩序和无政府状态，而无秩序和无政府状态并不是社会主义。任何人都无权把胡鬧、无秩序、无政府状态和专橫霸道冒充社会主义；因为要是那样的話，在群众中是会遭到反对的。你們不要以为，在我 26 日的讲话之后，群众只对宗派主义有反应。群众把一切問題，濫用职权、专橫霸道、权力过重和任意乱干涉等現象都包括在这里头了。这是一項濫用职权、专橫霸道、作威作福、輕視人民、无視群众的政策。人民把宗派主义这一概念理解为我們必須克服的一系列革命錯誤的梗概，同时了解到阿尼瓦耳的問題只是問題的一部分；如果想这样說的話，也可說是从錯誤的道路走上正确道路的轉折点。

我們不能允許在工人階級先鋒队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中存在我們所見到的这些情况，不能允許一个机会主义分子做群众团体的領袖，不能允許支部中有变节分子。如果出現了这样的事，那是因为我們的队伍向机会主义敞开了大門，我們應該严密我們的队伍。因此，我們應該規定参加支部的切实条件，做个支部成員，首先必須是个模范的劳动者。我們要到无产階級群众中去，我們在那里发展我們的队伍，吸收优秀工人，模范工人，勤恳劳动、历史清白、沒当过穆哈尔分子、不曾投票拥护独裁政府、不曾参加竞选

也不會與獨裁政府同流合污、沒當過警察和密探的工人。如果我們在這裡堅持這些標準的話，就不會混進任何壞分子。在我們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政黨中，現在竟有無數鑽進來的變節分子和機會主義分子，這是令人感到驚奇的。

在這裡，一個有歷史問題的人甚至可以當部長，但是他卻不能成為革命支部的成員。如果有人對我說：注意，某人是部長，或是某項工作的負責人，這倒不會叫我感到奇怪。這沒關係，我們只問他管理的好嗎？他完成任務和工作的好嗎？但是，如果有人對我說：有這種歷史問題的某人是革命支部的成員，我就會覺得奇怪了，我們必須使支部保持最純潔，最清白，因為最最重要的是黨，而不是國家機構。應該結束這種抽調黨的力量來加強國家機構的政策；國家機構和政府應該從群眾中選拔自己的幹部。黨應該選拔自己的幹部，應該保護他們，不要把他們送出去，不要把他們從一個工作調到另一個工作，因為我們所更需要的不是一個完善的國家機構，而是一個尽可能完善的黨。最好的東西應該是政治機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不是政府。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應該力求完善，然而黨比政府更重要，應該保護幹部，提拔幹部。

同志們，在這整個問題中，困難的是面對這一問題而不要鬧分裂和不和，糾正錯誤而不給機會主義抓到可乘之機，嚴厲無情地批評錯誤；該糾正的糾正、該改變的改變、該做的就做，而不留下機會主義分子可鑽的空子，因為這不是給機會主義分子任何可乘之機的時候，我們應當嚴密自己的隊伍。因此，我們提出，不能匆匆忙忙地改組支部。我們不應當操之過急，要從容不迫地工作，然而要作得周到，作得細致，使得我們的黨成為一個由優秀的模範人物組成的純潔的黨，在群眾中有威信，有名望，倒不在乎我們現在經歷危機，不在乎人家說閑話，說什麼統一革命組織已經不是火炬。本

来就不应当說統一革命組織是火炬嘛。

看到有人聚众豪飲胡鬧，每逢 12 月 24 日和 1 月 1 日清晨四点看到人們成群結队从庆祝聚会中出来，醉得东倒西歪，跳着康加舞，嘴里唱着統一革命組織是火炬，使人感到很討厭。是呀，統一革命組織是火炬，它燒毀一切，它破坏一切。这样的康加舞曲也許对自由党、普里奥党、統一行动党、一切腐化的旧政党更加合适，然而不适合于一个工人階級先鋒队的馬克思主义政党，應該把这个党看作人民所有的最神圣的东西。可以有一首庄严的贊歌，一首歌曲，然而不應該有一首醉汉跳舞的康加舞曲，更不應該說什么火炬。根本不應該自命为火炬。糟糕的倒不是現在有人說它不是火炬了，而是以前人們說它是火炬，而是以前一打开收音机就听到說統一革命組織是火炬。

的确，我們在經受这一危机，我們在繼續遇到危机，我們在繼續蒙受耻辱，我們甚至繼續称为統一革命組織，在此同时我們还在进行工作，以便今后改称社会主义革命統一党，然而到我們改称为党的时候，我們應該已經再度完全恢复了群众對我們的信任和信仰、我們在群众中的权威，應該已經組織好了所有支部。重要的是支部，而不是中层的干部。中层干部應該經受工作的考驗，让工作說明誰配誰不配，誰是优秀干部，誰有条件，誰的健康条件能胜任工作，誰的健康条件不能胜任工作，让所有干部都在工作中受到考驗吧。

我們要首先通过省委員会組織支部，要根据組織的書記处下达的方法和指示，甚至要依靠組織的書記处任命来指导这项工作的人員，我們要深入工人中心，深入无产階級中去。我們將建立一个无产階級的組織。我們在革命教育学校中花了几百万比索，并不是为了培育歪風邪气，并不是为了培养小資产階級。我們在这

些学校中花了錢，是为了培养工人階級中的最优秀分子，培养模范工作者。我們要深入工人中心，我們要使这个工人階級先鋒队、以这个階級(革命就是以这个階級的名义进行的)的先鋒队具有更多的无产階級成分，并要从这里选拔出应当去学习的人。我們要在所有支部中組織学习小組，我們要讓支部在这里面选拔那些显露出有才智、有眼光、有毅力的人，派他們去学习，把革命的錢花在这上头，而不要把学校变成公寓，变成那些到处碍事的人蹲的地方。我們要教育无产階級，我們要教育先鋒队伍，我們要成立支部，我們要从支部中提拔干部。我們要从基层进行这个工作。最重要的是基层。

这就是我們应当做的工作，这就是你們必須向同志們解釋的問題，必須消除怀疑，消除疑惑。这里不应当有怀疑，不应当有疑惑，不应当抱怨任何人，不論他是新的还是老的，不应当斤斤計較誰該負責任，同志們。我在 26 日說过，在这个問題得到解决以后，我們才能开始討論其他問題，例如同这一历史过程有关系的問題。現在要做的，是团結起来，工作，满怀信心地克服現存的缺点，当前的缺点。假如在这里还有头脑糊塗的人、还有不明白、想不通的人，那么应当清楚地向他說明，根据馬克思主义对他解釋，只要他是一个好革命者、一个好共产党員，他是会明白的，会了解的，一切怀疑都会消除的。首先，我們要注重事实，注意改进我們的政治工作，提高在群众中的威信，加强革命的群众力量，因為我們要在一年后比今天大有起色。在一年后，我們要使許多供应問題得到解决，我們要組織得更好。

必須繼續不断地同政治战綫上、行政战綫上、工作战綫上、农业、工业、一切地方的所有弱点进行不留情的斗争，我們必須成为同一切缺点、一切弱点进行斗争的勇士，不屈不撓地进行斗争。当

然不要认为我們將輕易地立即解决所有問題。我們不要抱幻想，免得以后我們又半途失望泄气。讓我們在开始工作时認識到工作是艰巨的，是长期的，是困难的，必須有恒心，必須堅忍不拔，虽然我們克服我們所有的缺点会有困难，但是我們應該抱有克服所有缺点的坚决目标，使得一年后我們的情况比今天大有起色，使得我們在二十年后不至于为今天的錯誤后悔莫及。

我們感到幸运的，所有革命者感到幸运的是，这些問題得到了及时的解决，我們能执行一种正确的政策，一种原則的政策，联系群众、集体領導和革命的政策，所有这些有害的風气从今以后能全部消灭掉，再也沒有傾向、派系和朋友私情。幸运的是，今天的少先隊員在二十年后不至于咒罵我們的无能，咒罵我們的錯誤。我們还能及时把工作做好，建立一个偉大的党，把我国人民的最优秀分子組織在一起，在我們党內的組織工作中、在行政工作中、在一切地方，执行一种方法正确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的政策，因为正如統一革命組織中的不好傾向在各个战綫上产生影响一样，好的傾向、原則的政策也将在所有群众組織中和各个工作战綫上产生影响。

同志們，我們做得及时，这是幸运。一个同志掉了队，虽然沒有被开除出党，但被开除出我們的领导机构，我們为此感到痛心。这种制裁是够还是不够，可以討論。今天查明的事实比当时采取决定的时候所了解的要多得多，而問題不在这里。問題不在于現在我們变得冷酷无情，問題不在于我們在处分方面过分了。这个例子是很好的，重要的是及时糾正，重要的是克服这一切。重要的是有机会得出一种从今以后永远执行的有准則和有原則的政策，以便使我們的党避免发生其他的党发生过的問題，以便使我們的党能够成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一个当之无愧的榜样。

同志們，這些就是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我們經過各次討論后得出的結果。同志們，你們今天要努力工作，以再次取得這個省的一切支持和熱情。同志們，願這個省將來成為范例，說明一種正確的政策帶來的全部好處，說明現在正在執行的真正的革命的原則政策帶來的全部好處。（掌聲）